

一战战败后德国为何走向独裁统治

刘铖

郑州警察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0

摘要: 一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依然是欧洲文化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音乐家、画家、科学家、作家和现代哲学家,他们的作品至今都推动着欧洲的文化发展。但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德国就走向了纳粹独裁统治,至今在许多历史学家中都没有统一的答案。本文试图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制裁、魏玛德国时期的经济衰败和不健全的民主这三个方面探讨德国走向独裁的原因。

关键词: 魏玛德国;《凡尔赛条约》;独裁;民主

前言

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都是战争的策源地。但由于现代武器的出现,当时整个世界变成了充满死亡和废墟的地狱,德国也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死亡,而且给每个参与战争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和痛苦。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施行大规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政策,杀害了数百万来自欧洲各地甚至是其他地域的犹太人。到现在为止,大屠杀给受害国和相关民族带来的巨大的创伤到现在都还没有愈合,这些因战争留下的无形的伤痛和有形的残骸时刻提醒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不要让战争之殇再次萦绕在整个地球上空。

回顾欧洲从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兴起到两次世界大战这一整段历史,一直有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德国为什么要走向独裁统治?直到十九世纪末,德国都还是欧洲文化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诞生了许多伟大的音乐家、画家、科学家、作家和现代哲学家,德国人也以理性著称于世,但还是出现了由纳粹头子希特勒把持的独裁政府。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有助于引导我们在危机和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重复历史错误,尤其是避免世界性的大战。现如今我们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但人类社会依然面临着一些局部的战争和少数落后的独裁统治,本文通过对二战时期德国走向独裁做出分析,试图廓清德国走向独裁背后的原因,其目的和意义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社会珍爱和平,避免战争的乌云笼罩在人类社会当中。

1. 一战后德国社会的整体概况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期待着宝贵的和平,以减轻战争带来的痛苦。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代表的战胜国,希望召开一次和平会议,解决由四年毁灭性战争造成的一系列的复杂问题,以避免下一次世界性的大战,因此,这些国家组织了巴黎和平会议,并签订了和平条约。和会期间战胜国各怀鬼胎,几经冲突和妥协,通过反复协商谈判,最终达成了《凡尔赛条约》,1919年,作为战败方和战争发起方的德国在巴黎凡尔赛宫无奈地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也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的结束。由于各个国家利益诉求不同,《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变得困难重重,战胜国还因为利益目标不同存在冲突,导致会议的决定都是经过“不愉快的妥协”后才能达成。亨利·基辛格称之为“美国式理想主义和欧洲式偏执狂之间的脆弱妥协”。^①

毫无疑问,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到了战争胜利者极其严格的制裁,尤其是经济制裁,协约国要求德国的战争赔偿达到2260亿马克(约合113亿英镑)。由于战争赔偿金额巨大,给德国经济带上了沉重的枷锁,以至于许多德国人认为该条约过于严厉和不公正。《凡尔赛条约》直接或间接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战争的种子。与此同时,德国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即魏玛共和国,然而,该共和国是在德国衰弱的不利条件下成立的。此外,《魏玛宪法》作为一部十分典型的进步宪法,但它没有和过去那种根深蒂固的专制做法和僵化的阶级划清界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20年代(Ludwig 726)。大量的战争赔款使德国面临艰难的经济

形势，急剧的通货膨胀使国家苦不堪言，因此，糟糕的国内形势使德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德国的领导人应该来自军队和精英阶层还是来自普通民众。

2. 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制裁

一战战败使德国在全世界失去了博弈的能力。一战结束后，协约国迅速采取行动，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以确保战后世界的和平并惩罚德国的战争罪责。自1919年3月始，取得战争胜利的五大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的政府首脑和外交长组成的“十人委员会”主导整个会议的进程，因为各国利益的诉求不同加上成员组成复杂，重重矛盾使得谈判的进度缓慢，难以做出令各国信服的决定。在谈判过程中，因利益的纠纷日本和其余各国外长先后退出十人委员会，实际上只剩“四巨头”，后意大利因要求领土被拒也退出，谈判最终由美国、英国和美国的政府首脑组成“三巨头”，即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把持。在既缔造和平又各方利益冲突的矛盾背景下，战争参与国于1919年6月在巴黎凡尔赛签署了《凡尔赛条约》，条约将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根据《凡尔赛条约》第231条规定：“协约国和参战国政府确认而德国也承认，由于德国及其盟国进行侵略而把战争强加于协约国和参战国政府及其国民的身上造成的全部损失与破坏的责任。”在许多德国人看来，这一条款是对民族的羞辱，因为它迫使德国承担了引发战争的全部责任。^②

此外，《凡尔赛条约》起初要求德国赔偿2260亿马克（约合113亿英镑），后因德国支付能力不足减至1320亿金马克，以赔偿战争造成的平民损失。即便是削减的赔偿款对德国来说也是重罚，超出了当时德国的支付能力。后来，由于德国在1923年末支付赔款，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鲁尔区。（德尼兹，2000：534）因此，许多德国人将赔款和占领视为民族耻辱。此外，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的领土减少了25,000平方英里（约13.5%的领土）和700万人口（约12.5%的人口）^③。在西欧，德国被要求割让领土以承认比利时的主权，此外，德国不得不将萨尔煤矿并入法国，并让国际联盟控制萨尔煤矿15年。在东欧，德国将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并割让出部分西里西亚领土，大量领土的割让也让德国人觉得大大损害了民族尊严。

自1919年签署《凡尔赛条约》以来，德国已经失去了超过十分之一的国家领土和人口，三分之一的煤矿和四分

之三的铁矿，并欠下1320亿金马克的巨额债务（顾奎斋，2010：95）。许多德国人认为这个条约过于苛刻和不公正，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这些制裁与屈辱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德国人希望诉诸于其他极权主义政策，并通过接受这些政策用来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从而恢复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3. 魏玛德国的经济失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德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战争的失败使德国背上了《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债务负担，为了处理巨额的战争债务，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不得不印制钞票购买外汇来支付赔款。此外，国外领土、人口和殖民地的大规模减少削弱了工业品生产能力和市场，导致缺乏经济资源作为后盾。从1921年8月开始，德国开始不惜代价用马克购买外汇，但这只会加快马克贬值的速度^④。随着马克在国际市场上的贬值，需要越来越多的马克来购买赔款委员会所要求的外币^⑤。

事实上，德国后来发现自己已无力支付赔款。马克在当时几乎一文不值，这使得德国不可能再用纸马克购买外汇或黄金，取而代之的是以煤炭等商品支付赔款。1922年上半年，马克稳定在1美元兑320马克左右。当时国际赔款会议不断召开，1922年6月，美国投资银行家小摩根（J. P. Morgan）组织了一次会议，会议没有产生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货膨胀爆发为恶性通货膨胀；到1922年12月，马克兑美元跌至7400马克；到1923年11月，1美元兑换42.105亿德国马克。^⑥

恶性通货膨胀危机导致德国商品价格迅速上涨，同时也引发了一波企业破产潮。特别是在1929年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经济危机蔓延到了整个西欧，导致整个欧洲陷入大规模贫困，德国也不例外。德国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它严重依赖美国的贷款来进行经济活动，由于物价飞涨和失业问题，大多数德国人负担不起生活费用，只能忍受饥寒交迫。面对社会混乱的局面，魏玛政府缺乏应对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的能力，逐渐失去德国国内民众对魏玛政府的信任。

魏玛共和国最初是协约国与德国妥协的产物，是在德国国内意志不坚定的情况下建立的。此外，魏玛共和国在短短的十四年间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魏玛德国的经济

问题包括恶性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和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等。面对这些经济问题，魏玛共和国并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改变经济上糟糕的局面。相反，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将这种失败的经济民生和屈辱的社会状况归咎于魏玛共和国。因此，德国人希望将软弱无能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的政府，以恢复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财富。

4. 魏玛德国的政治失败

魏玛共和国成立伊始，就遭到了左右两派甚至广大群众的厌恶和憎恨，形成了一种常被称为“没有民主派的民主（Primoratz 98）”的局面，此外，德国的民主传统有限，魏玛民主被普遍认为是混乱的。一些德国人怀着强烈的怨恨和复仇情绪，指责魏玛政府签署《凡尔赛条约》是不必要的背叛行为，同时，许多德国人对民主体制和解决方案缺乏信心。

尽管魏玛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满怀期望，但它还是在1933年让位于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纳粹党通过议会民主的合法程序当选为执政党，控制了整个国家，表面上看，德国是一个建立议会、颁布宪法、实行民主选举的民主国家。披着一层轻薄民主的外衣，德国仍然继承着古老的帝国传统，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拥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此外，尽管德国颁布了《魏玛宪法》，宣布德国是一个民主议会共和制国家，立法机构由选举产生，但《魏玛宪法》存在严重问题，尤其是总统权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平衡。《魏玛宪法》允许总统罢免总理，同样，总统也可以任命总理。《魏玛宪法》第48条，即“紧急法令条款”，在制衡制度不足的情况下，赋予了总统广泛的权力甚至可以中止公民自由权。^⑦在某种程度上，总统权力问题给希特勒提供了政治机会，在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后他迅速抓住机会掌握了德国的政权。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在其著作《第三帝国的来临》（*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中指出，“总而言之，魏玛的宪法并不比20世纪20年代的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更糟糕，甚至比许多国家的宪法更加民主。如果当时的情况不同，宪法中问题较多的条款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但共和国致命的合法性缺失使宪法的缺点被放大了许多倍。”（Evans 88）

正是由于魏玛宪法的缺陷，希特勒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德国总理。在纳粹党的控制下，德国政府被煽动起来，民粹势力所控制，最终走向了独裁。

结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单一的原因可以解释德国为何最终选择了纳粹党并走向独裁。德国作为当时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家、画家、科学家和作家，他们的作品至今仍激励着欧洲文化。（Peter 421）首先，《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实施了最为严厉的制裁，它让德国失去众多的领土，同时给德国经济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广大德国民众认为该条约过于严厉和不公，据统计条约的签订直接使德国失去了超过十分之一的国家领土和人口，三分之一的煤矿和四分之三的铁矿，导致德国社会上下都认为这是一种羞辱。此外，尽管德国通过颁布《魏玛宪法》组建民主体制并且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在这些民主形式的背后，德国实际上仍然保留着古老的、乡村的、等级森严的传统。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残余使得德国的民主既娇嫩又充满缺陷。因此，鼓动者希特勒正好利用德国民众渴望洗刷耻辱恢复民族荣耀以及政坛渴望复辟帝制的倾向，带领纳粹党利用有缺陷的民主赢得了选举，并积极推行极权主义政策，利用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把德国推向了向外侵略的边缘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总之，德国独裁统治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一方面，现代化国家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制度，避免极权主义，对独裁政治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一个现代化国家也不能忽视多数人的暴政，这样政府才能保持清醒，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利。考虑到任何一种民主政体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民主社会应该遵循民主的温和原则，不被民粹主义鼓动，从而避免走向极端，再坠入世界战争的深渊。

注释：

1 转引自维基百科,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cle_231_of_the_Treaty_of_Versailles.

2 转引自维基百科,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cle_231_of_the_Treaty_of_Versailles.

3 转引自维基百科,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cle_231_of_the_Treaty_of_Versailles.

4 转引自维基百科,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yperinflation_in_the_Weimar_Republic.

5 同上。

6 转引自维基百科,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yperinflation_in_the_Weimar_Republic.

7 转引自维基百科, 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imar_Constitution#Weaknesses

参考文献

[1] Catherine, Ann Cline. “ British Historians and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 .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Vol. 20, No. 1 (Spring 1988):43-58.

[2] Eric, D. Weitz. “ Weimar Germany and its Histories ” .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43, No. 4 (December 2010): 581-591.

[3] Evans, Richard J.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Print.

[4] Ludwing, Frederick Schaefer, David Henry Fowler and Jacob Ernest Cooke. Problem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The Challenge of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65.

Print.

[5] Peter, Rietbergen. Europe: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Print.

[6] Primoratz, Igor. Patriotism: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Print

[7] 陈乐民 . 欧洲文明进程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1-344.

[8] 德尼兹·加亚尔,等 . 欧洲史 [M]. 蔡鸿滨, 桂欲芳译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0: 515-559.

[9] 顾奎斋 . 如何认识宪政讨论中纳粹上台与现代民主的关系? [J]. 文史哲, 2010, (3) : 91-106.

作者简介:

刘铨, 1995年7月生, 男, 汉族, 江西上饶人, 助教,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文化。